

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

▶ 「立名探聲」：追索難民故事的倫理想像

” Establishing their Names and Searching for their Voices” : Towards the Ethical Imagination of the Refugee Story

doi:10.6752/JCS.201309_(17).0011

文化研究, (17), 2013

Router: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, (17), 2013

作者/Author：朱元鴻(Yuan-Horng Chu)

頁數/Page： 236-241

出版日期/Publication Date：2013/09

引用本篇文獻時，請提供DOI資訊，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。

To cite this Article,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.

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:

To link to this Article:

[http://dx.doi.org/10.6752/JCS.201309_\(17\).0011](http://dx.doi.org/10.6752/JCS.201309_(17).0011)



DOI Enhanced

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（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, DOI）的簡稱，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，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。

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，

請參考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For more information,

Please see: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，開始閱讀本篇文獻

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



「立名探聲」：追索難民故事的倫理想像 “Establishing their Names and Searching for their Voices”: Towards the Ethical Imagination of the Refugee Story

朱元鴻

Yuan-Horng Chu

有兩個最為古老、頻繁發生的政治與社會現象，卻直到今日仍然動人心魄，其一是「revolution」（革命），另一個是「exodus」（大舉出離故國）。今日台灣的族群指稱，比方說：「外省人」、「客家人」、「河洛人」，沒有例外，都各自蘊含了一個不同的「exodus」故事。今天論壇的主題「難民與移民」，是這古老議題「exodus」的當代篇章。

首先，我想要稍微鬆動一下我們的題目，難民／移民與冷戰之間的關係。剛才幾位講者提到冷戰期間幾種特殊的難民樣態，比方說古巴與越南的「boat people」被美歐的「自由」國家收容，或是像台灣以「反共義士」這樣的意識型態接納韓戰戰俘。確實，這些是冷戰時期特殊的難民樣態。在1975年西貢淪陷後數年之間的中南半島難民潮（越南、高棉、寮國），受到美、加、澳、法、德、英、日（依數額序）等國收容的難民計約120萬。但是如果我們綜觀20世紀整個世界，真正因為冷戰緣故而產生的難民並非最顯著的。也就是說，難民的產生主要原因並不是因為冷戰，而是因為民族國家在主權、領土、和人民之間的斷裂與錯動。

一戰戰後，1918年，隨著俄羅斯帝國、奧匈帝國、鄂圖曼帝國的崩解，依據和平條約出現的新秩序，在中歐與東歐造成疆域與人口上深刻的錯動，導致150萬「白俄羅斯人」（不是指Belarusian，而是指逃離紅色蘇維埃政權的俄國人，抵中國上海的即有2萬5千人）、70萬亞美尼亞人、50萬保加利亞人、100萬希臘人、數十萬德裔、匈牙

利人、羅馬尼亞人一時之間成爲流離失所的難民。¹二戰結束之後，1944-1950年間，單單是從波蘭、蘇聯、捷克、匈牙利、羅馬尼亞、南斯拉夫等地遭到強制「遣返」的德裔即計約1,200萬。希特勒藉口捷克、波蘭等地的德裔居民而進行併吞，注定了戰後德裔居民被驅逐的命運。但這些德裔在中歐東歐地區並非晚近移民，而是已經定居好幾個世代了，回到了「祖國」卻沒有家園，而是收容在難民營裡。²另個大規模難民的例子是1947年印度與巴基斯坦分裂爲兩國，數年間從印度遷徙到巴基斯坦的穆斯林約720萬，而從巴基斯坦逃往印度的印度教與錫克教人口約730萬。1971年，孟加拉自巴基斯坦分裂的戰爭，又造成約一千萬難民逃向印度（其中150萬在獨立之後返回孟加拉）。1948年第一次以阿戰爭，造成了約72萬的巴勒斯坦難民，同時有近70萬以色列人從阿拉伯各地區遷移到以色列。1959年西藏騷亂，約8萬藏民隨達賴喇嘛跨越喜馬拉雅山流亡印度。冷戰結束後1991-1992年間隨著南斯拉夫解體，巴爾幹半島的族群清洗造成大約270萬強迫遷徙的難民。

當前發生的，敘利亞內戰將近三年，已造成兩百萬的難民逃向鄰國土耳其、黎巴嫩、約旦、伊拉克。此外，聯合國統計敘利亞因內戰產生的「境內流徙者」(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)人口約400萬。另外有些悲慘程度不下於敘利亞難民，但是世界上很少注意到的，例如緬甸的羅興亞人(Rohingya)好幾個世代定居的穆斯林人口，在佛教徒多數的緬甸受到騷擾迫害，造成了大約30萬的難民逃出，被孟加拉收容在難民營，或是浮海漂向蘇門答臘的亞齊。還未逃出的70、80萬人，經常遭遇到佛教民衆、警察與軍隊的騷擾與迫害，成爲處境比難民更慘的境內流徙者。根據聯合國的統計，全球的境內流徙者人數比難民還多一倍，他們的處境比難民更糟糕，尤其是婦女與兒童。難民，事實上是逃離了國境，因此被當作難民對待。「境內流徙者」的基本概

1 Giorgio Agamben, *Means without End*(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, 2000), pp.16-17.

2 參閱 Keith Lowe(2012) *Savage Continent*(New York: St. Martin's Press), pp.230-248.

念是什麼？他們並未流亡出境，而他們所身處的國家，原本應該是保護他們的國家，卻成為凌虐他們的主要暴力來源：或許是針對少數族群或少數宗教的迫害，或許因為建壩或開礦而強徵土地的驅逐，或許是放任飢荒與族群掠奪的蔓延。

因此，當我們把鏡頭稍微拉遠來看，今天的論壇主題，冷戰意識型態只不過是造成了難民的某些特殊樣態。難民的生產其實來自於主權、疆界、人口的斷裂與錯動，通常和民族國家的建國、分裂或是內戰有極大的關連。冷戰的政治軍事支配體系其實遮蔽了許多造成難民的地方性衝突，甚至冷戰意識型態為這類衝突提供了假托的藉口。

由這個問題延續到我想談的第二點。今天我們的三位講者用台灣的例子所談的，比較是「賤斥」或「落魄」(abjection)的狀況，而Andrew Lam自身的故事，則是難民營裡面比較「有幸」(blessed)的一面。這是兩種難民樣態。Lam的書名標題裡的「越南離散」(*Vietnamese Diaspora*)，「diaspora」是個非常古老的希伯來語彙，現在我們翻譯成「離散」。在古老的涵義裡，Diaspora指的都是「遭咒譴」(cursed)的不幸意涵，因為別人有家有國，而你卻喪失了你的家國而離散。直到20世紀之前，這個字彙的意涵都是負面的。但是到了20世紀以後，「離散」開始出現了正面的意涵。我所知最早為「離散」狀態評析出正面涵義的是齊莫爾(Goerg Simmel)在1908年提出的〈陌生人〉(異鄉人)(stranger)，劉吉雄導演他的紀錄片標題也用了這個詞彙。目前我們所探討的Diaspora，是到了20世紀才有了「有幸」(blessed)的意涵。首先，相對於那些要逃離卻未能成功逃離的人們，或者相對於那些處境悲慘的境內流徙者，難民(refugees)事實上已經是逃出來的存活者(survivor)。浩劫餘生！不是嗎？經歷無情的生態災難、無常的政治動亂，眼前所有繁榮的生命、物種與文明，都是浩劫餘生，浩劫新生。

此外，再說Diaspora的積極性，我們經常不識得難民的另個面貌：身懷知識與才能的繆斯。難民所抵達居留之處，經常預示了文化綻放的福地，比如南宋的臨安，或是20世紀的紐約與香港。有本書我讀來印象深刻，*The Muses Flee Hitler: Cultural Transfer and Adaptation*,

1930-1945。讀社會科學或人文思想的大概都知道，1930年代之前，美國就像是歐洲的學生，所有的科學、哲學或是藝術，美國與歐洲其實有一段差距。但是後來情況不同了，什麼造成這樣的不同？潘諾夫斯基曾寫過一篇回首三十年來看藝術史的文章(E. Panofsky, “Three Decades of Art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: Impressions of a Transplanted European”)，他講到20世紀1930年代之前，藝術史只有歐洲有，研究重鎮都在歐洲，但是1930年代後，藝術史研究的新氣象、新天地卻是在美國。其他眾多智識領域也都如此。他的說法是：因為歐洲有個希特勒在四處搖撼果樹，而美國就等在樹下接果子。其實美國之外，英國、加拿大也都撿了不少果子。作家與學者像是佛洛伊德(S. Freud)、湯瑪斯曼(T. Mann)、喬艾斯(J. Joyce)、貝克特(S. Beckett)、布萊希(B. Brecht)、納博科(V. Nabokov)、奧爾巴赫(E. Auerbach)、卡西勒(E. Cassirer)、李維史陀(C. Lévi-Strauss)、堤利克(P. Tillich)、潘諾夫斯基(E. Panofsky)、布赫東(A. Breton)、卡內提(E. Canetti)、鄂蘭(H. Arendt)、馬庫色(H. Marcuse)、賴希(W. Reich)，作曲家像是巴爾托克(B. Bartok)、史特拉汶斯基(I. Stravinsky)、米約(D. Milhaud)、苟白克(A. Schoenberg)，以及科學家如愛因斯坦(A. Einstein)……我略過了許多我不熟悉的科學家（如化學、數學）以及建築領域的人物。這本書裡的繆斯還不包括企業與演藝界的人物。由歐至美，這是文化創造力區位的海變(sea change)。但請不要只看到這些熠熠名人，還有更多的少年難民，以及難民 / 移民的第二代。本論壇在座的Andrew Lam曾是越南難民營裡的11歲少年，成為了美國作家。我經常讀到美國作家或是法國思想家，太多是來自別國的難民，但最終他們被認為是「美國作家」或「法國哲學家」，我會覺得非常羨慕和嫉妒美國、法國。剛才聽到龔尤倩講到馬來西亞的例子時候，就想到蔡明亮，還有香港調景嶺難民窟長大的林百里，如今他們當然是台灣導演、台灣企業家。

現在回過頭來問，那些被賤斥對待的落魄難民 / 移民，跟我們前述那些慶幸撿到的繆斯，差別到底在哪裡？真的差別在於不同的人、不同的階級秉賦嗎？我不這樣看。我認為收容國看待自己以及對待難

airiti

民 / 移民的氣度，決定了難民 / 移民的處遇，也決定了收容國自身的文化可能性。我們應該認知，難民是個過渡的身分。難民因為故國家園的顛覆或破毀而產生，因為他國的慷慨而被收容在難民營裡。難民營，是個模稜的概念：可以是慷慨的接待(hospitality)，卻也是隔離的圈閉(confinement)。最終是哪個意義凸顯，要看對待與時間。如果難民營裡不僅接上水電，也開進校車，讓裡面的兒童少年也能就近上學，如果成年者可以在附近社區安置工作……或許五年、十年，「難民營」即可功成作廢。如果一座難民營圈閉隔離逾15年不變，那麼再怎麼人道管理或是再多非政府組織的探訪，都改不了隔離監禁的拒絕與刻薄；這般狀態下的憐憫，跟害怕與嫌惡一樣，有著保持距離的效果。就學、工作、通婚，這三項基本權利，可以當作以公民資格排拒難民的關卡，卻也可以是養成公民身分有益而必要的預備。這兩種觀點，在歐美判分了右翼排外或是進步知識分子的態度。在長期圈閉隔離的難民營裡當然只看到非我族類的賤斥形象，怎麼可能看見繆斯的能力與才華？怎麼可能想見或給予兒童少年的未來可能性？怎麼可能讓異文化與流離經驗成為文化創造的積極元素？

藉著修訂文字稿的機會，我想補充一點論壇現場沒時間表達的想法。劉吉雄導演的計畫引起我一些憧憬。我對於難民營的建物不怎麼留戀，倒是對於是否可能讀到難民之後的生命史非常期待。唐龍與馬曉濱的綁票死刑案，不幸還是個離散「遭咒譴」的故事，仍是個賤斥的落魄形象。然而在這個現成的司法媒體事件之外，紀錄片是否可能捕捉到難民營最後一批在桃園輔導就業約50位難民的生命故事？目前能接觸到他們的訊息極為稀少，例如1990年一篇報導〈越南華裔難民，在生活底線上掙扎〉³，2003年一篇專訪〈陳氏娣：有幸，到講美結婚生子定下來；有情，不走了，愛上台灣人情味〉⁴。時間是有意義的。自1988年難民營熄燈關門，迄今25年，我們期待讀到四分之一個世紀的生命歷程，以及他們第二代的故事。倘若，他們有人能

3 張平宜。1990/07/26。《中國時報》。

4 劉禹慶。2003/03/11。《自由時報》，高雄市版。

像Andrew Lam一樣發聲，憑著書寫自身的離散經驗贏得讀者，當然令人欣慰。不然若能夠藉著紀錄片的探訪與報導，讓我們知道他們的「名」，聽見他們的「聲」，也將是很有意義的貢獻。鄂蘭有一句露骨直白的見解令人印象深刻：

最終，唯有名聲(fame)能回答難民們在社會各個角落的無盡怨嘆：「沒人知道我是誰」；確實，有名聲的難民，就如同一隻有著名字的狗比起隨便一隻狗，有著更佳的生存機會。⁵

鄂蘭並非刻薄地形容「他們」難民，而是洞察她曾經身屬的難民處境。失根的難民在異地求生，「沒人知道我是誰」是他們遭遇的現實。就如齊莫爾在〈陌生人〉裡跟「在地人」對照：他們沒有土地、沒有綿密的親屬網絡、沒有長久的鄰里關係、沒有行業公會的同儕……。名聲，是抽離了原生土壤的陌生人跟這個世界連結、被認作也是「我們」的可能方式。廣泛研究難民的法國人類學者阿吉耶(Michel Agier)在他《世界邊緣：今日難民經驗》(*On The Margins Of The World: The Refugee Experience Today*, 2008)一書的結論呼應鄂蘭的見解：「難民需要的是名聲」。

在台灣，藉媒體炒作隱私八卦是兜售名聲的每日操作，超星超偶的選秀舞台是名聲工業的制式生產線，輕易受封為「k神」、「z神」……的年輕名人對自身盛名手足無措。這般名聲追逐似乎令人疲憊。但難道這不正因為名聲的價值維度在台灣其實仍然刻板單調、狹隘或匱乏嗎？這是為什麼我期待劉導演紀錄片的探訪與報導，能從角落與邊緣帶來即令平凡生活也能感動人的故事，因為那是離散新生；讓閱讀者知道他們的名聽見他們的聲，那是創作新的維度。

5 Hannah Arendt, *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* (New York: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, 1968), p.287.